

史學與史學問題

史高脫 (H. Scott) 著

翁之達謝元範合譯

史學與史學問題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廿三年八月初版發行

實價 大洋 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題問學史與學史’
(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Ernest Scott

譯者 翁之達 謝元範

發行者 章錫琛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目次

歷史與地理·····	一
歷史與傳記·····	三
歷史與自然科學·····	五
歷史與愛國心·····	八
各派的歷史·····	一三
歷史的活力·····	一四
史學方法·····	一五

歷史與地理

通常所寫的歷史是關於人類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他們的意志之衝突，他們實現理想的企圖等等的。人類雖然有許多征服自然的事績，但他們總不免為地球上的自然狀況所駕馭。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全部生命，祇是一種順應環境的進程。地理是支配着歷史的。法國從前一位總統曾經說，歷史乃胚胎於地理。●英國司圖亞特(Stuart)時代早年有一個地理學家叫海林(Peter Havlin)的，在他的宇宙一瞥(Microcosmus, 1625)一書中，更古怪地表示一種同樣的觀念如下：

「不錯，地理沒有歷史就沒有生命和動力，並且游移無定鵠；可是歷史沒有地理也就像一具死屍，既無生命，又無動力，充其量，祇是慢騰騰地向着理解一方面前進。」

假使地球的形狀，不是像現在的樣子，歷史當完全不同，這是不須說明的；同樣，凡氣候，山岳，河流，海洋和沙漠，都是大政治家的主宰，無論他們如何聰明計畫法。據一個研究領土疆界的名家說，國際聯合會和其他調整世界大事的方法，也許可以順利地廢平國際間猜忌不睦的褶痕和縐紋，「但是它們很難影響到這種猜忌不睦所根據的動機，除非承認十分之九的猜忌不睦是因為地理上的種種不平等和困難。」^①

現代人文地理學認為，歷史頂多是以人類行為的用語來表示的地理。拿人文地理學的詮解者的話來說，「歷史的不少部分是種種事件所表現的地理要因之連續。在麻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熱狂的廢奴運動後面，它看到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的花崗石土壤和散鋪着漂石的田地；在南方擁護奴隸制的長期戰鬪後面，它看到為潮汐進退之路的佛琴尼亞州 (Virginia) 的肥壤和密西西北州 (Mississippi) 底地的沃土。這就是哈寶氏 (Harden) 所說，「歷史是運行中的地理」一句話在地理學上的意義。今日的地理事實，到明天就變為歷史的要因了。^②有些研究者受了這種學說的

鼓吹，說道，文明盛衰的真相當從地球上各地氣候的變遷一觀點來解釋。我們必須顧到「受壓的等溫線在歷史上的效果。」

我們不大知道埃及，希臘，美索不達米（Mesopotamia）等國在她們文化昌盛的諸世紀所享受的究竟是那種氣候。依有些大家的意見，不見得這些國土在兩三千年間已經遇着多少氣候上的變遷。但另有一般人卻懷疑這個假定，以為這些國土一定有被奪去最刺戟人類身心的氣候狀況的變遷，然而他們也祇好承認沒有很精確的證據來證明這個結論。

然而韓廷頓先生（Mr. Ellsworth Huntington）卻大膽提出他的推論道，「我們對於過去和現在的氣候變遷加以深長的研究，就曉得有些最刺戟的狀況的所在地方，一世紀和一世紀不同，當古代諸大國躋於強盛的時候，她們享受着一種氣候的興奮劑，這是和現代諸大國所在地方所享受的一樣。」

韓氏又說，「時至今日，凡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就有某種氣候。在過去的時代，似乎

文化發達的所在，也有同樣的氣候。所以這個條件好像是國運昌隆的必要條件。這可不是文明的原因，它的所在當更為幽深。這也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條件。它祇是幾種之一，就好像源源不絕的清水是健康的主要條件之一。清潔的水是不會使人健康的，好的氣候也就不會使一個愚昧而墮落的民族跳到文明的高度。^⑥

我們所以不能證明這種廣大的主張，其困難之點即在沒有歷史一方面的證據，和地理一方面所搜集的事實之不充分（我們要下結論，必由此種事實演繹出來）。但是這個論題還沒有研究到家。巴克爾（Buckle）在他的文化史（一八五七年）論「自然律對於社會組織的影響」一章中，有關於氣候的觀察，足供參考，但是他的方法和知識，未見得比韓廷頓先生的令人滿意。韓氏的關於氣候的幾種著作，是很有興味的。

關於氣候對於文明之影響的論辯的缺點，即在它區別——在若干事例中，則無區別——氣候本身與人類因可預防的疾病（其發生之狀態是限於氣候的）所致的能力喪失，不大適當。舉例言之，Biharzia是一種曾經在埃及及猖獗了幾千年之久的疾病。我

們一考查埃及的木乃伊，已得到一種證據，表明耶穌紀元前數千年中住在埃及的人民，多死於這種疾病。造成此病的微生物孳生在水裏面，沾着這種毒水的人就給它鑽進皮膚。其結果減少人的生活力，繼之以疾病和死亡。這是自埃及三千年前各朝代以來埃及的氣候本體已經變遷的證據，這個證據雖不令人滿足，但我們說，當底比斯（Thebes）和赫刺克利奧波里斯（Heracléopolis）朝諸國王和他們的先主與嗣君堂堂皇皇地統治埃及的時候，*Bilharzia* 的寄生物已在埃及民間繁盛起來，是極可能的。可是這種流行病，在病理學家從事發現，究竟它怎樣降臨到大戰時駐在埃及的英國軍隊前，還是不爲人所知的。自然，*Bilharzia* 是附帶於埃及的氣候的，但現在既經確定了它的原因，它是可以預防的。再者，鉤頭蟲病是一種地球赤道熱帶地方所易有的疾病。這種微生蟲一鑽進人類的內臟，就給它吞噬紅血球，釀成貧血病，使人懶洋洋地無精打彩，並且魯鈍不活潑。在司太爾斯博士（Dr. Charles Stiles）指出此種蟲之在美國南部各州是可以撲滅的以前，還沒有人設法和它對抗。⑤此種因有機體所生的有害結果，是氣候之咎。

間歇熱（或稱瘧疾）在歷史上也是有關重要的病。曾經有人主張美索不達米文明的衰落大概可歸因於這種疾病。一六九八年蘇格蘭所屬德利英（Tarien）殖民地的全部崩潰，一部分也是因了它的緣故——儘管說這個殖民地縱令不為瘧疾所蹂躪，但在政治上也會一敗塗地，上面一句話仍舊是對的。瘧疾又使羅馬的坎判納（Roman Campagna）成為熱病常至的地方有數世紀之久。但羅士爵士（Sir Ronald Ross）研究的結果，證明這種病是由於害蚊（Anopholes 或稱瓢子蚊）咬人所傳染的微生物；自從有了這個重要的發現之後，地球上有些地方已經把瘧疾驅除了（在從前的這些地方，瘧疾是一種無法可治的惡疫）。其他各處，一到當地居民有人勸導他們採取必要的防止法，也可以驅除它。

以上的例子表明氣候是常被認為有害的結果之媒介的。那些有害的結果固然隨着氣候狀況而有，要非氣候狀況的附屬物。我們很可以說到氣候對於歷史的影響，也可以懸想消失的文明歸其淪亡之因於氣候的範圍。但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各世紀中氣候

變遷的假定，來說明文明的衰落，卻是一個疑問。如果我們說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屬於生物的（就此名詞的狹義而言），而非屬於氣候的，不更對嗎？

復次，我們考究像國家之興亡這樣複雜的現象，有一層不能不謹慎提防。除掉假定的氣候變遷之要因或因氣候的或寄生物的緣故而致民族衰頹的要因，還有許多可能的要因待我們研究。外侮的頻仍，貿易路線的變更，政策的錯誤，政府的腐敗，內訌，窮兵黷武之摧殘元氣，都是其他亡國的原因。我們曉得，那般過於着重經濟史觀的人，已經感到莫大的痛苦，如果這種地理史觀的強迫觀念深入了靈敏的人的心中，當屬再可憾也沒有的事。在地理學各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很好的，我們從這裏面所能得到的價值，是我們應當引為滿足的。但是當我們歡迎它的時候，也不得過於熱狂。

然而氣候與地理對於歷史的影響，以及天氣對於歷史上特殊事件的影響，並不是一種空論，我們有事實證明。七世紀阿拉伯人從他們的故鄉遷徙出來一事，不能單單歸因於謨罕默德的說教所感召的熱狂。這在那位先知興起來以前，已經開始了。當時阿拉

伯祇能維持灌溉的方法來養活日益繁盛的人口，他們的生活狀況使他們不得不實行移民，來救濟飢饉。「飢餓與貪婪乃是他們的推動力，不關宗教的事，宗教不過給與他們一種團結力和中心力而已。」^⑤在回教崛起於世界之前，阿拉伯地方經歷着一種乾燥的過程，不知若干世紀。這種自然界的變遷，加以商業的一蹶不振（由於政治上的種種原因），使他們不能不有一個大規模的移民運動。

地理上的證據暗示我們，在有文字記載前一個時期中，波羅的海（Baltic Sea）海岸一部分之坍塌，使嘎特族人（Goths）從那里遷徙到黑海和多腦河流域（Danube Valley）。俄國的草原和中歐平原之平坦無阻，鼓動了匈族人（Huns）和嘎特族人的野心，使他們在四、五、六世紀輕而易舉地侵入西歐羅馬化的各地。據說羅馬的覆亡是因爲中國人築城防禦韃靼人（Tartars）之故。這種似是實非之議論乃得力於一個假定。即謂當中亞遊牧民族不得逞於東方的時候，他們於是轉移視線於西方。如果有一座大山脈把歐洲從亞洲畫分開來，康士丹丁大帝（Constantine）固不必在博斯福魯

(Bosphorus) 地方另外建設一座京城，或許吉朋 (Gibbon) 也不必來寫他的歷史。庇里尼人 (Pyrenees) 所以能捍禦薩拉森人 (Saracens) 的入寇，全靠馬太爾 (Charles Martel)。因為薩拉森人雖然能夠順路衝進高盧 (Gaul)，當馬太爾在都爾 (Tours) 大敗他們的時候，他們再也不敢越境作孤注之一擲了。

十八世紀後葉波蘭亡國的慘史，已經有人歸其咎於波蘭國的「惡劣之組織」，她的統治階級之腐敗。他們着重這些弱點，自無不當之處。但是波蘭在地理上的地位（她是一個沒有天然疆界的平原國家）恰恰給她四周圍三個強大的軍國（德奧俄）一種引誘，使她們常起覬覦之心。把軍隊開進波蘭，是一樁容易的事。反過來講，瑞士有山為屏障，這種天然的保障使這個包括三種民族，說三種語言，信兩種宗教（舊教與新教）的國家，能維持獨立的國家生存。

英國在美洲大陸殖民的性質，完全和西班牙不同。其異點不能歸於任何一原因。人民的氣稟，政府的政策，都是極重要的特點。但當司密斯大佐 (Captain John Smith)

比較西班牙人從他們的南方領地所得到的財富，來說明他那個時候英國人在佛琴尼亞所得到的小小成功時，他有着正當的根據來指出種種不同的自然環境。他說：「西班牙人所取得的祇是土人的擄掠品，而非他們自己的功勞……假使他們這些豐饒的地方和佛琴尼亞一樣野蠻，粗鄙，移民不善，少加種植，少加勞作和少施肥料，他們相當的勞力，也不會比我們的多生出好處。但是英國人不期而遇着一塊壞的地方，在這裏，我們祇見到一羣游手好閒，目光短淺，一盤散沙的人民，他們不知道金子銀子或任何貨物，他們除自手至口，顧到一時的需要外，不計其他。英國人在可以將該地的貨物製造完美前，還得作生活的準備。」司密斯結束他的議論道：「如果我們恰巧碰到有財富的地方，我們當然可以穩得這種財富；但是我們錯過了它，也就不想豔羨那般找到它的人。」^①那個時代正是人們尋覓金銀以為殖民的主要報酬的時代，照那個時代看來，英國人在北美的運氣，確實不佳。在佛琴尼亞和新英格蘭，並無金子銀子。地理上的環境使他們祇好為生計之資而工作，因之使他們的靈魂得救。

還有許多例子，也影響了歷史上的事件。在這些例子中，成爲連續不斷的要因者，倒不是氣候與地理，而是天時之影響範圍。如果把它們列爲一表，當很有趣。大霧，大風，溼季與燥季，雪，冰雹，都有它們的效果。法國大革命軍事史的轉機，即在伐爾美（Valmy）一戰（一七九二年）。前此諸役，法人都喫了敗仗。當此戰爭開始之晨以前，下了兩星期以上的雨。普魯士軍隊一早就在阿爾良（Argonne）泥濘載途的路上冒着雨向通巴黎之道前進。四周的景色，原爲霧所蒙罩，在午前不久，霧忽消散，現出嚴陣於許多小山低坡上的法國軍隊。普軍乃不得不奮力去把他們從這個地位驅逐開來。但是普軍一面爬山坡，一面衝鋒，前仆後繼，終歸無效。這大概是因爲他們走得疲乏了，不能再前，又因爲對着法軍猛烈的礮火，無法上去。我們一讀雙方紀述，就明白法軍在伐爾美的勝利，與其歸功於法軍的勇敢善戰，毋寧說是阿爾良地方飽和的泥土助成的。我們從政治中可以找到同等的例子，英國保護貿易政策之顛覆，卽其一也。柯布登（Cobden）的辯論固然感化了披爾爵士（Sir Robert Peel），但是使他翻然改計的，還是天時。在人們的記憶中，一八

四五年的秋天，是最潮溼的時季，且有害收穫；「英國的穀律是給雨打掉的。」^①但在這些和其他許多可引證的事例中，我們還是應該像在論氣候的時候一樣小心，不要說得太過份。伐爾美一役，度摩利士（Dunouriez）的將略，和法軍礮隊之位置巧妙，放射準確，當然有很大的價值；同樣，有英國一般主張廢止穀律者的鼓動，纔使天氣能夠對於穀律施以最後的打擊。

文明可說是一種淡水的生長物。原始人類都是棲止於河岸上和有水的地層邊，住在這種地方，他們才可以掘井。^②過去的許多文明，是河邊的產物。底格里斯（Tigris），幼發拉底斯（Euphrates），尼羅（Nile），印度斯（Indus），甘基斯（Ganges），布拉馬普得拉（Brahmapootra），中國的長江大河，萊茵（Reine），賽因（Seine），底比（Tiber），波（Po）諸河各有其文明發展出來。

「在高盧的許多神祇當中，」一個法國學者寫道，「那些時常出現並最受人民虔敬崇拜而享大名的，是和泉水有關的神祇。我相信，這是因為泉水河流在家族與鄉村的

經濟生活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之故。它們給與人畜生活的保障，因之，引用博物學家普林尼 (Pliny) 的話來說，「它們建立了城鎮並產生諸神祇。」

海洋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傳布已成立的文化之媒介，但是人類在能夠利用海洋之前，還得先一步學會造船與航海的技藝。人類在社會中的生活，最初是（現在仍是）憑藉淡水的。一國人口的生長，並非為該國供給民食的能力所限（因為在通常的情形下，糧食是可以從外面輸入的），而是為該國供給淡水於人民的力量所限。地球上有些多可歸於沙漠一類的地方，祇是因為缺乏淡水而不能生產，因之不能居住。這些沙漠地方的沙土含有大部分有害食料植物的礦質成分，所以更難供人使用，自然，此外也有適於灌溉因之富有生產力的沙漠。

次於淡水而為發展文明的地理要素者，就是泥土。曾經有人把泥土稱為「地球上最有價值的無機物」。這話不能說是不對的。流域和平原的土壤常因附近山岳的侵蝕而變新，其肥澤膏腴是由於泥土。泥土將世界各大陸的形狀改變的地方，大概比地